

##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理论及战略\*

姚树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近40年连续不间断高速增长，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工业大国，成就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伟大的奇迹。然而，在人均GDP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命题，不仅要学习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更要发挥国家自然地理优势及政治人文体制优势，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能力。党的十九大没有提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提出在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再用两个15年时间，分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新时代，中国不仅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保持几十年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回顾过去40年发展历程，指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及挑战，然后提出“内生增长、马阵跨阱、板链拉动”新时代经济发展理论及战略路径，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提供理论支撑和战略实施办法。

关键词：经济增长 地区差距 基础设施 国际投资贸易 金融体制改革

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增长，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中国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内外各种增长压力变得越来越严重和复

姚树洁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丁颖讲座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李达三特聘讲座教授。

\* 作者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73033）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6YJA790058）的支持。

杂。如何面对各种压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命题，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跨国比较来看，过去40年，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能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普遍存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或者改进空间。

那么，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否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呢？这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话题。然而，为什么党的十九大那么自信，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不提，而是直接勾画出一个分阶段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呢？应该说，中国政府信心满满，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通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积极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政府的自信，主要来自过去40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人能够克服各种错综复杂的挑战，一步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一步一步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差距，包括生产率、技术、创新、教育、国防建设等的差距。那么，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能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继续维持今后30多年经济社会稳定的发展呢？这是本文想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因为，只要能够回答这一问题，那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继续前行，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就有了明确的思路和答案。

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和对外开放、加入WTO、融入全球生产分工贸易体系获得的比较优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以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必须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中国过去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牵引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式使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优先发展，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这既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如果从经济政策层面处理好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资本技术转移，也将带来巨大的内生经济增长潜力。

从国家区域发展与全球化战略角度来看，国内区域均衡发展及“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战略举措。这两大举措都有其深层

次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针对国内区域均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理论及战略研究具有极大的政策研究空间。

关于跨国经济发展趋同的研究诸多。<sup>[1]</sup>现有研究认为在政治经济体制类似的国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之间，经济增长出现趋同现象；而体制差别很大的国家，如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出现趋同，还可能出现扩散。

对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证研究很多，<sup>[2]</sup>不过这些研究都局限于世界经济危机之前中国的发展状况，而2008年以后的发展却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sup>[3]</sup>例如，2008年以前，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快于中西部地区，使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不断扩大。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传统产业迅速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地区，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投资开始全面超越东部地区，形成一种从没有过的区域增长趋同现象。<sup>[4]</sup>

这两种现象是中国能够经受住强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还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2011年以后，原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

[1] Barro, R. 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407-443; Barro, Robert J., “Xavier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2): 223-251; Mankiw, N. G., D. Romer, and D.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2): 407-437.

[2] Yao, Shujie and Zhongyi, Zhang,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Diverging Clubs: A Cas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a, 29 (3):466-84; Yao, Shujie and Zhongyi, Zhang,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b, 38 (2): 167-186; Yao, Shujie, “On Economic Growth, FDI and Exports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Applied Economics*, 2006, 38(3): 339-352; Yao, Shujie and Kailei, Wei,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esent of FDI from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7, 35(1): 211-234; Yao Shujie, Yang Xiuyun, “Air Transpor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2, 19(3): 318-29; Yao, Shujie; Liu, Chang, “Trade Policy Review for China: Continuing Globalisation Amidst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2012, 35(12): 1645-1661;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第30-37页；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第33-39页。

[3] 李敬、陈澍、万广华、付陈梅：“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关联及其解释：基于网路分析方法”，《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第4-17页。

[4] 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第72-82页；姚树洁、韩川：“从技术创新视角看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5期，第1-6页；姚树洁、刘畅、欧璟华：“中国‘新常态’下的发展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7期，第9-10页，原载于《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第1-6页。

车”中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逼迫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逼迫东部沿海地区不能只靠来料加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产业转移、升级以及开创新产业，来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内陆地区成了吸纳传统产业的巨大腹地，加上技术进步和交通设施建设，使其成为后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增长最快的地区。<sup>[1]</sup>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有它的特色，那么如何利用这些特色，如何应对因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对中国产生新的挑战和困难，都是中国新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过去没有完全模仿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而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中国也不可能因为自己的特色而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十大经济体中比较开放的国家，用贸易量/GDP的比值衡量，中国比美国和日本更加开放。<sup>[2]</sup>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国内特色，也必须保持一个高度开放的态势。

这对经济理论研究者 and 经济发展实践者都是一个挑战。在余下部分，本文将回顾过去中国近4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如何面对这些挑战而必须遵循“内生增长、马阵跨阱、板链拉动”的经济理论和战略路径；最后做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成就与经验

中国从1970年代末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在总结改革开放以前30年经济社会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伟大判断，赢得全国上下一条心去开创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改革初期面对的阻力是巨大的，要从计划经济转变成成为政府与市场同时起作用的运作模式，从全面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与竞争，不仅西方发达国家没

---

[1] 姚树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指导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第4~26页，在“学习贯彻‘5.17’讲话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笔谈”专题中；姚树洁：“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理论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22~24页。

[2] Yao, Shujie; Liu, Chang, “Trade Policy Review for China: Continuing Globalisation Amidst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2012, 35(12): 1645-1661.

有先例可循，苏联的发展经验也不可能在中国推广。<sup>[1]</sup>中国必须全面考虑自己的特色，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丰富等特有禀赋，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判断，打破了传统思想禁锢，为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自由市场，建立产权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尽管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但是，习近平还是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牢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还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本质还没有改变。

通过实践、探索、总结经验，对发展有利的政策可以继续推广，对发展不利的，可以重新设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进，苏联没有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经验。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而经营权却可以承包给每一个农户。在人多地少、机械化水平低落的具体国情面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当时最适合中国农村的经营管理模式。把土地经营权承包给每一个农户，只要单位土地面积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单位产品生产成能够不断降低，那么社会经济效益就可以不断提高，对国家集体农民都是有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七年时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15%。到了1985年，中国就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和工业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也增强了全面推进改革的信心。

1980年代以前，私营企业雇工人数受到非常严格控制，全国对外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为了打破这一格局，邓小平提出搞经济特区建设，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浦东新区，探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经验。当时开放所面对的思想阻力是巨大的，把开放政策和出口产业发展集中在少数城市，一方面是因为经验不足，缺乏人才资金及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是通过集中全国资源，先行先试，在沿海开放城市取得成功和经验以后，再向全国其他地方推广。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以后，中国大规模吸引外资，通过合资企业，促进国内企业改革和竞争，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和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历史，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国外很少有人看好中国，本国也有许多人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第3~10页；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第4~12页。

时至今日，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过去20年，中国经受住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冲击，没有倒下，反而变得更加坚韧和生机勃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两次危机面前表现得非常冷静和沉着，体现了自己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从来没有动摇过，循序渐进，从易到难，从实体到服务的改革理论思路，从来没有发生过混乱。哪怕是面对危机，中国继续搞建设，继续推进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惊慌失措及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无可奈何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自信，中国才可能把应对危机和灾难当成是发展的一个过程，当成伟大国家崛起必须面对的正常磨难。一个经不起磨难和考验的国家，是不可能富强的。经过了两次重大危机，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制造国及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最大生产国。目前中国的粗钢产量是全球总产量的一半，是美国钢产量的10倍，汽车产销量是美国的2倍，移动终端的用户数是美国的3倍，发电量是美国的1.5倍。许多硬性指标，中国已经远远超过美国。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蛮干出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脚踏实地有板有眼做出来的。中国成功背后有一套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作为指导，那就是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采取务实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

表1 2001年及2015年主要经济体占全球GDP总量比重变化

GDP(万亿美元)	2001年(%)	2015年(%)
美国	32.1	24.3
欧盟27国	18.7	20.6
中国	4.1	14.8
日本	12.5	5.9
印度	1.5	2.8
巴西	1.8	2.1
俄罗斯	1.0	1.8

来源：作者从TheTradingEconomies.com的数据整理计算出来。

中国近40年的经济表现，可以从表1所示的简单数据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GDP占全球的近1/3，之后的占比逐年下降，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4.3%。同一时期，中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从4.1%上升到了14.8%。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提高幅度大于美国的下降幅度。此消彼长的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到2025年，中国和美国的GDP总量可以拉平，因为目前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而美国的贡献率却不到20%。

中国经济增长是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前提，而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推力。表2的数字显示，1978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8%，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7.4%。同一时期，城市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从17.2%上升到了53.4%。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就等于增加两个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生产量。因此，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农民就业的非农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表2 中国人口就业和产业结构变化（1952—2016年）

主要指标	单位	1952年	1978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人口	百万人	575.0	963.0	1360.0	1367.0	1375.0	1383.0
城市	%	12.4	17.9	53.7	54.8	56.1	57.4
农村	%	87.6	82.1	46.3	45.2	43.9	42.6
2.就业	百万人	207.0	402.0	769.8	773.0	775.0	776.1
农村	%	83.6	70.6	50.3	49.2	47.8	46.6
城市	%	7.2	17.2	49.7	50.8	52.2	53.4
3. GDP	十亿元	68.0	365.0	59524.0	64397.0	68905.0	74413.0
农业	%	50.0	27.9	9.3	9.1	8.8	8.6
工业	%	20.6	47.9	44.0	43.1	40.9	39.8
服务	%	29.4	24.2	46.7	47.8	50.2	51.6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2017-12-08]。

邓小平主张吸引外资，是中国技术持续进步和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商品出口如潮水般

地涌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

在2000—2014年的14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增长了9倍，贸易顺差增长了17倍，这是中国外汇储备曾经高达四万亿美元的主要因素（表3）。尽管2015年和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这两年的贸易顺差反而大幅度增加，主要体现在外部贸易环境恶化，以及中国进口的大宗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

表3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顺差情况（1994—2016年）

国际贸易	1994年	2000年	2008年	2010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总量	237	474	2562	2974	4160	4300	3870	3686
出口	121	249	1429	1578	2210	2340	2224	2098
进口	116	225	1133	1395	1950	1900	1645	1587
顺差	5	24	296	183	260	440	579	511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不同年份数据。

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结束了以前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出现了9%的正增长，充分体现中国经济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展现出来的韧劲以及内部供给侧改革的有效作用。

总结近4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经验，我们可以归纳如下。首先是政府一直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毫不动摇，哪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周边各国都在争相通过贬低本国货币价值来刺激出口时，中国依然稳住了人民币汇率不变，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改革开放态度使中国投资者对自己国家有信心，其他国家投资者对中国也有信心。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政府更是应对自如。在西方主要经济体普遍大幅度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步上升，使中国的GDP连续超过了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以点带面、从难到易、从实体经济再到虚拟经济的渐进式改革。这样的改革措施，有别于苏联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改革之路，证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苏联的休克疗法却导致该国分崩离析以及经济元气遭到彻底挫伤。

政府开明、人民勤俭节约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第三大要素，也是中国有别于其他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最重要的特色。政府开明在于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摆脱贫困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彻底消灭贫困。习近平所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前面几届政府努力基础上，提出更加具体的扶贫措施，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通过全国范围内无遗漏建档立卡，为精准扶贫开创了全球范围内从来没有过的扶贫攻坚先例。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各级政府通过兜底行动，保证每个家庭最低收入。对那些有劳动能力但是无法摆脱贫困的家庭，通过多种形式，包括生产帮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补助等措施，有计划、分层次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对那些生活在大山里或特别偏远的农户，则通过搬迁扶贫办法，让这些农户搬迁到有生产或就业可能性的地方，彻底铲除发生贫困的土壤。

人民勤奋和节约是中国成功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要素，也是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19世纪以来整整100多年的战乱，使原来占全球产出比重1/3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变成一个破烂不堪的穷国，GDP占全球比重下降到了1%，人均收入还不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如此漫长的战乱。虽然改革开放以前走过一些弯路，但是，中国人站起来了非常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之后中国经济建设和腾飞，靠的就是这种劳动热情和艰苦努力，解决了吃饭问题。加上节约，中国人不管是高收入或是低收入，都非常讲究节约存款，非常注重子女教育。有了存款，搞建设就有了资本；注重教育，就能积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与西方福利国家通过大规模借债消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此消彼长的最好解释，也是中国近40年来长时间不间断高速增长的最好解释。

中国经济建设成功的第四大要素，就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ICT）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多地广，ICT技术的成熟和广泛推广，使中国占尽了天然的竞争优势。因为这些技术一旦投入使用，供应商对边际用户的成本等于零或几乎为零，而用的人越多，供应商的收入越多，这就成就了许多大型供应商，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企业集团，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等。人口众多、地缘辽阔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民用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特别是近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高铁，

表现得更加充分有力。

记得1990年之前，中国没有什么高速公路，可现在中国每年建造的高速公路长度就等于全英国一个国家高速公路总长度的2.5倍。中国在海运和航空方面，在1990年之前是很落后的，而现在全球十大海港，中国就占了七个。现在中国一个最大海港上海港的年吞吐能力就已经超过全美国所有海港的年吞吐能力，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经济现实。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等一大批大型机场的年运送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高铁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也是因为技术进步、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三大中国独特要素所推生的，高铁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并对西方国家实施弯道超车的重大利器。

中国能够成功的第五大要素就是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许多外国人眼里好像缺乏民主选举，并得出结论说没有民主选举的政党容易腐败，也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是外界对中国政治的误解和歪曲。如果真像某些人说得那么简单粗暴，那么，中国近40年突出的经济表现就无从说起。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外界的扭曲和误解完全相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核心的奋斗目标40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过。

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提出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改变了中国的用人制度，保证整体领导活力。尽管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因为体制机制来不及健全和实施，出现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和体制缺陷进行腐败，但是，中国共产党打击腐败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八项规定”、“两学一做”、“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思路，通过巡视全覆盖，形成了压倒性的巨大震慑力。五年期间，查处军省部级官员440多人，其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43人，厅局级官员8900多人，县处级官员63000多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sup>[1]</sup>党的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还要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省、市、县三级监察机构，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对全国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实施全覆盖监察。

有了邓小平的干部年轻化思路以及习近平坚决反腐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仅具备了合法性，也是中国政治社会长期稳定的基本保障。这一点，

[1]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http://www.shidi.org/sf\\_E9E7A61EA88A48A5899110E1FB3A5095\\_277\\_30764B41120.html](http://www.shidi.org/sf_E9E7A61EA88A48A5899110E1FB3A5095_277_30764B41120.html)[2018-01-05]。

许多外国人看不到，有些国内的人也看不到。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如此大的国家，能够坚持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可以超越它们的政治保障。

## 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冲击是巨大的，许多西方国家已经用了十年的时间，还没有彻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水平，英国央行2017年10月宣布把基准利率回调到0.5%，说明复苏力度极其微弱，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稳健发展的曙光。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虽然正在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不稳定，主要是量化宽松政策还没有终结，长期超低利率和滞胀还没有终结。就算能够走出超低利率周期，能够终结量化宽松，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系列反自由贸易政策出台，英国脱欧，欧盟与英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撕裂性的脱欧谈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闹剧，美国接连不断的枪杀案，等等，说明西方世界正在经受着分崩离析的严峻考验。美国和西欧国家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福利制度的粘性正在受到冲击，而改变福利结构却要使广大民众接受直接利益损失。在种种压力下，政府决策举棋不定，政府领导力在民间一再失去信任。外界这些不确定因素，形成一个对中国很不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原来靠20%以上增长速度的国际贸易和大量吸引外资推动两位数高速增长格局，在2011年以后就被打破了。原来靠出口拉动的沿海地区面对大规模产业转移，需要重新考虑产业布局。内陆地区后发优势也很难沿用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不一样，但唯一相同的就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吸引外资和加入WTO以后所带来的体制改革和开放红利基本消失，工业生产的低成本红利也基本结束，中国经济增长再也找不出明显的刺激点和兴奋点。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及啃硬骨头阶段。

为了维持稳定经济增长，中国只能利用近40年积累下来的资本、技术和工业基础，努力挖掘内生增长潜力，而靠内生增长动力拉动的GDP增长，就很难达到两位数的水平，这是中国在后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经济从2010年的第一季度开始，GDP增长速度从12%下降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7.9%（图1）。2012年以后，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但是下降的

幅度不断缩小。到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速度下降到了6.7%，是近20年来的最低增长速度（图1）。可喜的是，2017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比前一年提高0.2个百分点，扭转了五年来增长速度持续走低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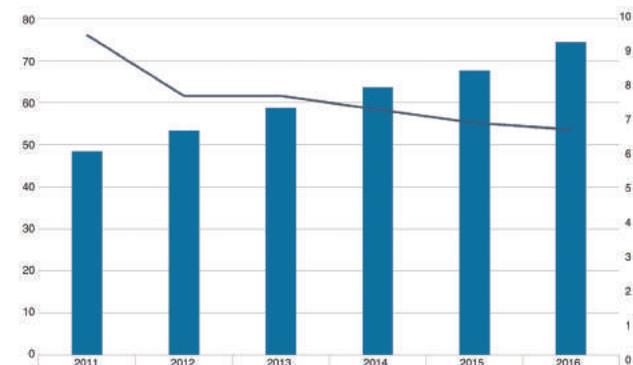


图1 2011—2016年全国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单位：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从过去五年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看，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首先，持续走低的增长速度折射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折射出外部环境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中国以前主要靠物质、能源和人力的绝对增量拉动经济增长，而过去五年单位GDP能耗和物耗持续下降，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自然环境改善。再次，过去五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是因为基数大，经济绝对增量却是持续提高的。在这五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一直走在了全球十大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最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出现硬着陆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社会效果，包括国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全国每年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300万个，减少贫困人口超过1200万人。

目前，少数学者对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充满担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因为种种不利因素，中国没有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首先，债务水平持续提高，整个国家债务与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其次，一线城市房价过高，严重阻碍实体经济发展，抑制着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开发严重过剩，城市化发展不健康。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严重污染，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投资从东部流向中西部，全国整体投资效率下降，生产成本上升。再次，福利政策实施，生产要

素成本提高使中国出口逐步失去国际竞争力，外贸与GDP的比重持续降低，2017年贸易顺差直线下降，资本外逃，富人外流，严重掏空中国实力。最后，国内投资增长从过去20%以上的速度下降到了个位数水平，而且还出现不断下降趋势，这很难维持今后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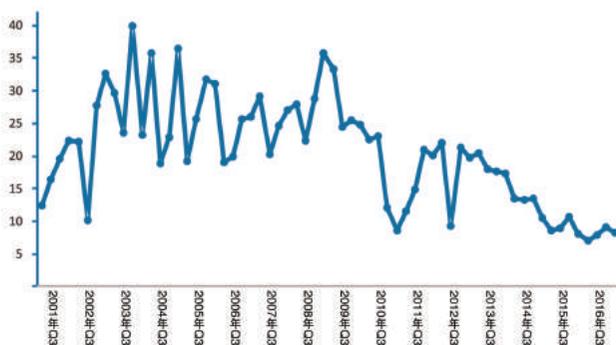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季度投资增长率变化情况（2011—2016）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季度数据。

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经济也是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实现增长的。上述所指出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谁也无法回避。中国正处于全球的中高收入水平，各种问题和挑战最为集中。例如，债务高，是问题，但也不一定不可以克服。关键是债务用在何处？是内债，还是外债？是短期债务还是长期债务？再比如，高房价，是问题，也可能不是问题。关键是高房价是不是真正的需求拉动，还是投机拉动？如果是投机拉动，能不能用打击投机的方式解决问题？投资增长下降，也是一样的道理。投资增长率下降，会不会导致投资效率提高？或者，投资增长下降是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能不能通过改变政策刺激投资？

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了答案，就可以为政府政策提供参考。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对上面的问题作一一解答，我们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从中国目前的实际出发，去寻找一个可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向和实践路径。有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战略措施，上面所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下一节的主要内容，也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理论和战略措施

综合上面讨论，下面我们提出一个崭新的发展理论，那就是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的理论。在面对国内外各种压力情况下，中国要保持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形成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态势，就必须坚持“内生增长，马阵跨阱，板链拉动”的经济发展思路。

“内生增长”是指在后WTO和后世界经济危机时代，中国已经不能被动地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走，而是在保持比较高水平的开放格局下，通过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及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去努力创造一个不受外部恶劣条件所干扰的内部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

回顾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虽然都与开放及贸易自由化离不开，但是，对大型的经济体来说，仅靠开放和贸易很难成为经济强国。例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比较开放，贸易占GDP比重也比较高，但是，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关键是内部经济活力，尤其是技术进步、教育和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时，国内技术落后，自我创新能力比较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吸收外国技术，通过“看中学”与“做中学”，先把现有其他国家技术学会，学不会的可以购买，购买不到的就只能自我创新。

经过近40年的引进、学习、自我创新，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不仅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还是科技创新中心。其他城市也在迅速跟进，包括武汉、成都、沈阳、西安、重庆等内陆和东北地区城市。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世界总贸易量和外资流出量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逼迫中国进入新常态，逼迫中国经济必须依靠自己的市场、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源去挖掘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内生增长”的内涵。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将继续吸引外资，继续扩大进出口的能力和空间，但这已经不可能成为国内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提升国内消费能力必须靠全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局限于少数发达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尤其是领先世界，统领世界新业态的产生。机械化、智能化向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纵深推进发展，提高现有行业生产效率。高铁、核电、可再生能源、现代农业、医药、新材料、大型飞机、无人飞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数控智能机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必将改变国内工业结构，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空间。

国内市场扩大，国民消费能力提高，还可以来自缩小甚至消除区域、城乡、

工农差别，通过农村现代化建设、城市化建设、落后地区建设、生态建设和乡村旅游业发展，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医疗保健产业发展，从落后地区和发展短板中寻求发展空间。

“马阵跨阱”把中国目前150多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当作一匹匹骏马。跑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五大城市，紧跟其后的是其他所有副省级城市，第三梯队是除了上述城市以外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重庆、长沙、合肥、郑州、昆明、南宁等一大批大、中型城市，加上内陆地区一些资源丰富型城市，如包头、鄂尔多斯、大庆等。中国的这些城市，许多已经跨过陷阱，有的正在奋力跨过。再过十年，它们将全部跨过，而且还要带动它们周边地区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跨过陷阱。

如果跑在前面的骏马在跨“阱”以后继续奔跑，而跑在后面的马比前面的马跑得更快，那么，中国就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必要条件。下面我们可以用具体的数据证明在后世界经济危机时代，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的良好格局。图3所示，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找到有连续数据的285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以前是处于上升趋势，而2008年以后却处于下降趋势，说明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城市（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别在不断缩小。这一时期，发达城市经济持续增长，而落后城市却增长更快，已经形成一个快马拉慢马、慢马追快马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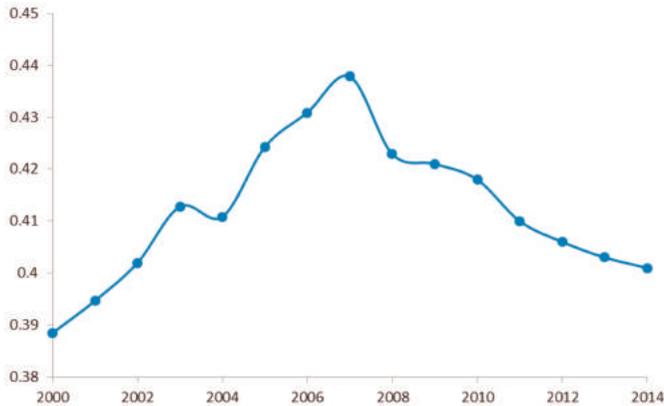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285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基尼系数（2000—2014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不同年份资料收集而成。

表4 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2017年1-6月GDP总量及其同比增长速度

省市区	GDP(亿元)	增速(%)
西藏	555	10.8
重庆	9143	10.5
贵州	5732	10.4
云南	6448	9.5
江西	8961	9.0
宁夏	1398	8.6
安徽	12645	8.5
福建	13290	8.3
河南	20308	8.2
四川	16080	8.2
陕西	9581	8.2
浙江	23383	8.0
湖北	15871	7.8
广东	41958	7.8
山东	35017	7.7
湖南	15276	7.6
青海	1204	7.6
海南	2198	7.5
江苏	40842	7.2
广西	8180	7.2
新疆	4363	7.2
天津	9387	6.9
山西	6578	6.9
上海	13909	6.9
北京	12407	6.8
河北	16405	6.8
内蒙古	8467	6.6
吉林	6124	6.5
黑龙江	6108	6.3
甘肃	2993	5.0
辽宁	10297	2.1
全国	385108	6.9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

从2017年上半年全国最新的统计数据（表4）也可以看出，增长速度排在前11位的省市区，只有福建省位居东部沿海，其余十个省市区都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贵州、西藏和重庆的增长速度依然是两位数，排在全国最前面。这些省级层面数据也反映了全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态势。

增长趋同不等于稳增长。稳增长主要体现在主要的省市区，也就是那些体量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而稳定。2017年上半年，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和湖南等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的平均速度，这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定海针”。中国两个经济体量最大的省——广东和江苏，如果进行全球排名，他们可以进入前15名。广东2017年的GDP将有可能超过俄罗斯。中国GDP一年的增量就要大于全球排名前20的国家，三年的增量就要大于一个印度，五年的增量就要大于排名全球第四的德国。

因此，只要中国能够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目前的速度还低一些，再坚持七至八年时间，到了2025年，人均GDP就可能超过13000美元，也就是说，跨越了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名义GDP将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离这个转折点已经不远。但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还不仅如此，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还要继续保持稳增长态势，实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的强国目标。

“板链拉动”的经济增长，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经济分为若干个地区板块，每个板块都有若干个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城市群就是“板”，通过城市的聚集效应以及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丛作用，每个城市群都是周边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经济增长中心，通过外溢作用，这些中心都能带动一整片地区的发展。高铁、高速公路、航空和互联网+，都是国内发展的链条，这些“链”把各个城市群联通起来，大幅度降低各个城市群的沟通成本，极大促进生产要素、信息和技术的扩散速度和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发达板块和落后板块的经济趋同发展，在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异的同时，提高全国的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效率。“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板块通向全球的“链”条，为中国站在世界的最高点提供更加充分可靠的发展空间。另外，成渝、武汉和长三角连成国内的“长江黄金水道经济带”，贯穿整条长江流域与“一带一路”的联系。

通过这种“板链拉动”的增长布局，国内将形成“三纵三横”的经济组织网

络，覆盖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与农村。不仅如此，通过“一带一路”向周边的国家延伸，在拉动周边国家发展的同时，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化、全球化，使国内的企业和生产要素能够走出去，从而取得更高的要素生产率。

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主要目的是利用外资，促进进出口，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姚树洁等把当时的开放，归纳为“以点带面”的发展方针。<sup>[1]</sup>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管理经验不足，政府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四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上海浦东新区和海南岛等国家级开放区。

“以点带面”，就是先集中力量，发展一批开放城市，使之成为拉动其他地区的“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当中心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对周边地区来说，能否受到“增长中心”劲力的拉动，却受到了距离和其他条件的影响。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末，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但是，东、中、西部地区内各省的发展水平（人均GDP）出现收敛现象，而区间的发展水平却趋于扩散，导致区域收入距离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三个明显的经济“俱乐部”。

姚树洁等从理论上提出“东部的增长是先靠培育包括四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浦东开发区在内的多个增长中心。在这些中心形成增长动力之后，拉动了东部各省市的增长趋同”。<sup>[2]</sup>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经济增长中心的距离太远而没有得到有效的拉动，所以造成区间差距扩大”。

为了更好地发展内陆地区，缩小区间差别，姚树洁等建议在内地地区设立自己的经济增长中心，并把发展重点放在武汉、西安、成都和重庆等内地地区的大城市。这种政策建议，与1990年代末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部的战略举措不谋而合。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重庆直辖以后2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成为拉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级经济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及“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翘板。

经过多年努力，加上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2008年的

[1] Yao, Shujie and Zhongyi, Zhang,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Diverging Clubs: A Cas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a, 29 (3):466-84.

[2] Yao, Shujie and Zhongyi, Zhang,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b, 38 (2): 167-186.

经济危机、迫使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发展重点向内陆地区迅速倾斜。2009年以后，内陆地区各省的GDP和投资平均增长速度，开始明显超过东部地区各个省市，使区间发展出现明显趋同收敛现象，并形成了我们所定义的“马阵跨阱”地理空间增长态势。

2012年以后，随着内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省与省之间的生产力距离继续缩小。国家整体实力大幅度上升。但是，现阶段却面临了新的挑战。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每年两位数，变成2016年的6.7%。从中观层面看，传统的产能过剩，产业技术亟待提高，国民经济面临转型和升级双重挑战。从微观层面看，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价格不断上升，国家失去了昔日靠廉价资源争取国际市场的传统比较优势。

不过新形势下，中国也出现了40年前所没有的国际竞争优势。一方面是资金雄厚，除了有巨大数量的外汇储备以外，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在高铁、核电、装备制造、建筑材料、工程建筑、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始凸现国际领先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昔日一个只靠少数经济区拉动的“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已经被许多大面积、大规模、高水平的城市群所代替。这些城市群，不仅出现在东部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环渤海，而且也出现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圈，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圈，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咸经济圈等。2017年，兰渝铁路和西成高铁开通，成都到西安的时间从原来11个小时缩短为四个小时，重庆到西安的时间从原来的11个小时缩短到五个多小时。这两条铁路有效地联通了西部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城市群，对西部经济发展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促进及趋同作用。预计到2017年年底，渝贵高铁将投入运营，到那个时候，重庆到广州的时间将从现在的16个小时缩短为六个小时，使西部的所有大城市与中国三大经济增长中心之一的珠江三角洲紧密联系起来，对促进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发展差距，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鉴于此，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构想，就是要把上述经济圈成片地联系起来。对内，其目标是“板链拉动”每个经济圈周边大、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发展。对外，其目标就是联通所有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国家，为中国企业谋求更加广阔稳定的发展空间，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此我们可以用图4来表示“板链拉动”的增长模式与“一带一路”的内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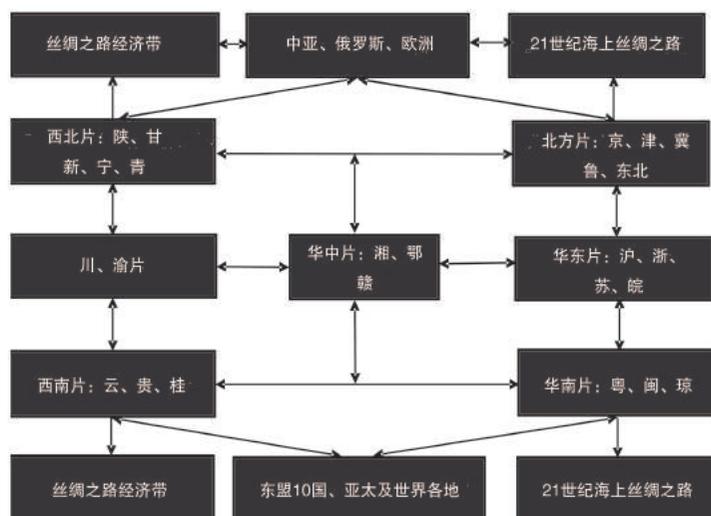


图4 “板链拉动”增长模式和“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简单起见，全国分为若干个地区板块，每个板块都有若干个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增长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通过交通通道、通讯和网络连通左边的地区板块向北与中亚、俄罗斯、欧洲联动，向南与东盟十国等国家联动。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沿海各通商大港口从海上出发，连通东南沿海与全世界各国。另外，成渝、武汉和长三角连成国内的“长江黄金水道经济带”，贯穿整条长江流域，与“一带一路”联系。

通过这种“板链拉动”的增长布局，国内将形成“三纵三横”的经济组织网络，覆盖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与农村。目的是在中心地带强劲发展的同时，把周边的所有资源，特别是土地、人力、水、森林、草原，都拉动起来，把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潜能挖掘出来，以达到全国资源的最大效率。

不仅如此，通过“一带一路”向周边的国家延伸，在拉动周边国家发展的同时，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化、全球化，使国内的企业和生产要素能够走出去，从而取得更高的要素生产率。

通过“内生增长”、“马阵跨阱”和“板链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概念，中国新时代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标，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就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理论思路，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其中，“内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马阵跨阱”是有效的区域战略布局，“板链拉动”是实

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高铁在中国的独特作用，中国正在规划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不仅是过去几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领域，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作用将无法估量，也是全球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中国特色优势。高速铁路也是“板链拉动”增长模式可以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 讨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通过回顾过去4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结成功经验，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经济走向成功的基本思想，后面几代领导人的继续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廉政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政府务实、循序渐进的改革路线；中国人民勤劳节俭特有的中国文化；ICT及现代交通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广泛应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产生巨大规模经济效应；科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快速发展不断提高全国劳动生产率等，以上都是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发展优势。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主要是受外部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内部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的影响，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超过30年两位数增长以后的自我调节过程。尽管目前各种压力和挑战巨大，但是，这些挑战和压力不是现在才有的，更不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在近40年的发展中，所面对的调整、压力和不确定性，一直存在。但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中国特有优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把挑战和压力当成是发展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大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面对的磨炼。相信未来任何困难和压力，都挡不住中国持续向前发展的信心和力量，因为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新时代是中国“最接近、最有能力和最有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过去40年，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因为中国独特的优势，以及已经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体制基础、管理能力、科技水平、规模经济，足以使中国能够自信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持续长时间的稳定增长，直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和城乡差异是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发

展潜力的空间和时间所在。中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使已经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率先进入发达经济行列；还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改造，使落后地区努力去追赶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一个“马阵跨阱”的空间地理增长格局。

中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区已经发展了许多规模可观、现代化、充满经济活力及科技创新能力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通过现代交通系统建设，尤其是高铁系统建设，互联网+和智能化渗透，已经连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形成“板链拉动”增长态势。在这个整体内部，要素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地区之间交易沟通成本不断降低，有效快速推进了全国一体化建设。另外，“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连成一体，使国内要素效率最大化，拥有更大、更加富有弹性的发展空间。

因此，“内生增长”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思路，“马阵跨阱”是促进“内生增长”的地理空间战略布局，而“板链拉动”是“马阵跨阱”形成的重要战略措施。

根据这一思路，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智能化、“一带一路”建设将持续很长时间，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推手。其次，中国将合理布局各个区域城市群，加速重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推进产业向更加合理地区集聚，形成全国性和地区性竞争优势。第三，加快科技创新步伐，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压倒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第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补“三农”发展短板，释放农业、农村、农民更大的生产潜能，建设生态优美宜居农村和小城镇，促进农村旅游产业发展升级。最后就是政府功能转变，从原来直接参与市场，转变为充分利用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把政府的努力聚焦在社会服务和民生领域，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扶弱、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政府廉政建设、法制建设、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等领域。■